

今文尚书 语言研究

钱宗武 著



岳麓书社

今文尚书法语言研究

钱宗武 著

王其生著

錢宗武著

唐長吉詩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夏剑钦
封面设计 胡 颖

今文尚书语言研究

钱宗武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富洲印刷厂印刷

199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60,000 印张:10.5 印数:1—1000

ISBN 7—80520—652—X
H·22 定价:11.5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斟换

《今文尚书语言研究》序

《尚书》诘诎聱牙，是我国古籍中最难通读的一种。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语言上看，《尚书》文字歧异和通假字多，僻词僻义多，句子成分省略多，往往出现歧义。当时它与口语接近，人们容易理解。到了后世，社会现实和汉语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尚书》语言就变得晦涩难懂起来。

自汉代以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各有创获。而湖南汨罗周秉钧先生所著《尚书易解》五卷，“核之以诂训，衡之以文法，求之以史实，味之以文情”，深入浅出，由博返约，最为可读。钱君宗武，秉钧先生之佳东床也。师从乃翁研习《尚书》，多历年所，已升堂而入室矣。所著《尚书入门》、《尚书今译》（与江灏教授合作），颇受读者欢迎。宗武更着力于《尚书》语言的探讨。先后发表有关论文近二十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专著《今文尚书语言研究》，全面深入分析今文《尚书》的文字、词汇、语法及其语料价值，体系完备，胜义纷呈，在《尚书》研究中作出了新贡献，对汉语词汇语法史和上古汉语研究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可喜可贺。

开展专书语言的全面研究是近十多年里才有的事。这种研究范围有限，比较容易下手，但要真正深入达到

高水平则不容易。它要求研究者对所研究的书一句一字理解透彻，不可囫囵吞枣，而且对整个汉语史和汉语某一断代的发展面貌要有相当全面的了解。专书语言其实也就是某一断代语言的缩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可能有理想结果的。宗武基础扎实，学识广博，他是参照两周金文和先秦其他典籍来研究今文《尚书》的语言，所以获得成功。

这几年里，宗武担任着相当繁重的行政工作，业余时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专业科研，焚膏继晷，孜孜兀兀，新的科研成果不断问世。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宗武有这种坚持进取的精神，实在值得学习。学无止境，宗武风华正茂，如日中天，以他的才华和勤奋，今后定能做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我于此有厚望焉。书将付梓，我觉得很好，写了上面一些话，算是序言。

向 熹
于川大风雨居
一九九六年二月八日

目 录

序

第一章 今文《尚书》及其语料价值	1
一、《尚书》及今古文《尚书》的并行和演变	1
二、今文《尚书》的语言特点及语料价值	14
第二章 今文《尚书》文字研究	34
一、先秦引《书》异同例	35
二、《史记》引《书》异文例析	51
三、《说文》引《书》异同例	77
四、今文《尚书》文字歧异的主要成因	105
第三章 今文《尚书》词汇研究	115
一、重言词辨析及重言词的特点	115
二、附音词的形态特征、结合方式和成形动因	131
三、复合词的种类、特点和成因	141
四、成语的结构类型、音律节奏和演变规律	160
五、单音词的词义特点	191
六、通假的早期形态特征和通假的界定	202
第四章 今文《尚书》语法研究	217
一、自称代词及其特点	218

二、对称代词及其特点	244
三、“厥”“其”的同义类化	272
四、“者”尚未出现及类似“者”字结构的语言现象	283
五、“也”尚未出现兼论句末语助的句逗标识作用	291
六、特殊词序及特殊词序的辨正	300
七、特殊的省略现象	315
主要参考书目	328
后记	326

第一章 今文《尚书》及其语料价值

一、《尚书》及今古文《尚书》的并行和演变

《尚书》不仅是一部古代重要文献，也是一部具有复杂流传历史的古代典籍。

《尚书》大约在先秦就已经有了定本。《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孔子运用普通话，那是在讲习《诗经》、《尚书》和执行礼仪的时候，都用普通话”。可知孔子时《尚书》已是儒家讲习的主要课本了。《庄子·天下篇》也说：“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证明先秦的知识分子都阅读过《尚书》。

《尚书》最早只叫做《书》，春秋战国时期与《诗》对称《诗》、《书》，《诗》为文学读本，《书》为政治历史读本。西汉才开始称为《尚书》。刘熙的《释名·释典艺》说：“《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汉代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孔安国解释为：“上古之书”。刘熙和孔安国的解释基本相同。虽然文献典籍中还有别的解释，但学者们大多认为《尚书》书名的含义就是“上古的书”。《尚书》成为儒家经典以后，又叫做《书经》。《书经》作为专名大概起于宋代。

《荀子·劝学篇》：“《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论衡·正说篇》：“《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尚书》的内容多和政事相关，大部分篇目或者是专题论文，或者记载了远古的历史传说。

《尚书》的作者是上古的历代史官。我国的史官制度源远流

长。甲骨文中有专管贞卜的史官，金文中史官的名称就更多了。文献记载我国古代设有专门记录君王言行的史官，《礼记·王藻》称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行，汇编成册，就成了《春秋》和《尚书》。《汉书·艺文志》说：“君举必书”，“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春秋》按年、月、日的顺序逐条记录国家大事，《尚书》就记录君王和大臣们的言论和政令。

先秦的书籍经常引述《尚书》，陈梦家先生统计，《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墨子》、《礼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九种书引用《尚书》就有一百六十八条^①。汉代的《纬书》说《尚书》原来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为一百二十篇，其中十八篇为《中候》，一百零二篇为《尚书》。《汉书·艺文志》说《尚书》有一百篇。先秦引《书》具体提到篇名的约有四十多篇，其中有三十多篇不见于今文《尚书》，可知先秦《尚书》的篇目数肯定超过今存《尚书》篇目数。《尚书》记录君王言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篇目数量一定十分可观。到了先秦，《尚书》成为政治历史教科书必定经过整编，甚至经过多次整编。整编者是谁？《尚书》的最早定本究竟有多少篇目？现在已经难于考定了。

今存《尚书》的篇目内容是根据朝代编排的，全书共分四部分，依次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虞书》的虞，相传是上古国名，国君为舜。舜，姓姚，名字叫做重华，属有虞氏，所以又叫做虞舜，国名为虞。舜生活的时代大约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那时候实际上只有部落联盟，还没有产生国家，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仍采用传统说法。《虞书》除开篇《尧典》记叙唐尧的历史传说外，主要记载虞舜和大臣禹、皋陶等人的对话，所以称《虞书》。《夏书》是夏代的政史资料。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600年）。开国君王为启。启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禹，禹属夏后氏，又叫做夏禹，启就定国名为夏。唐尧、虞舜和夏禹都是传说中上古的圣王，

《尚书》中记载他们言行的篇目不多，汉代马融、郑玄给《尚书》作传注时，合并《虞书》和《夏书》，称为《虞夏书》。《商书》是商代的政史资料。商（约公元前 1600 年——公元前 1027 年）的祖先是虞舜的大臣契，被封于商，后来契的第十四代孙汤赶走了夏的末代暴君桀，就把祖先的封地名作为自己的国名。《周书》是周代（公元前 1027 年——公元前 256 年）的政史资料。周的祖先古公亶父曾经定居周原，《史记正义》称“因大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周代约历 800 年，34 王。《周书》各篇主要记载武王、成王、康王、穆王、平王时代的史料。

今存《尚书》共有五十八篇。《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各部分的篇目和次第如下：

1.《尧典》，2.《舜典》，3.《大禹漠》，4.《皋陶漠》，5.《益稷》。

以上《虞书》。

6.《禹贡》，7.《甘誓》，8.《五子之歌》，9.《胤征》。

以上《夏书》。

10.《汤誓》，11.《仲虺之诰》，12.《汤诰》，13.《伊训》，14.《太甲上》，15.《太甲中》，16.《太甲下》，17.《咸有一德》，18.《盘庚上》，19.《盘庚中》，20.《盘庚下》，21.《说命上》，22.《说命中》，23.《说命下》，24.《高宗肅日》，25.《西伯戡黎》，26.《微子》。

以上《商书》。

27.《泰誓上》，28.《泰誓中》，29.《泰誓下》，30.《牧誓》，31.《武成》，32.《洪范》，33.《旅獒》，34.《金縢》，35.《大诰》，36.《微子之命》，37.《康诰》，38.《酒诰》，39.《梓材》，40.《召诰》，41.《洛诰》，42.《多士》，43.《无逸》，44.《君奭》，45.《蔡仲之命》，46.《多方》，47.《立政》，48.《周官》，49.《君陈》，50.《顾命》，51.《康王之诰》，52.《毕命》，53.《君牙》，54.《冏命》，55.《吕刑》，56.《文侯之命》，57.《费誓》，58.《秦誓》。

以上《周书》。

《尚书》篇目名称有的取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的取自人名，如《益稷》、《太甲》、《盘庚》、《微子》、《君牙》；有的取自物名，如《金縢》、《梓材》；有的取自篇目论述的中心内容，如《禹贡》、《洪范》、《无逸》、《立政》。不少篇目名称还包括了称为典、谟、训、诰、誓、命的文献类别，如《尧典》、《大禹谟》、《伊训》、《仲虺之诰》、《甘誓》、《说命》。汉代孔安国的《尚书序》就把《尚书》篇目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体式，唐代孔颖达分为十种：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②。我们分析《尚书》内容，粗线条的归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体式。

1. 典。《说文》解析“典”的形体结构是从“册”在“丌”上。丌，音箕，几案。典的字形象简册端放在几案上。可见，典不是一般的政治文件，是最重要的政治文件。《尚书》中隶属“典”这一类体式的篇目，主要记载上古的典章制度。如《尧典》、《禹贡》、《洪范》、《吕刑》、《周官》等。

2. 诰。《说文》：“诰，告也。”蔡邕《独断》：“告，教也。”《尚书》中隶属“诰”这一类体式的篇目，有君王的教令诰诫，有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劝告，还有祈神的祷告。这一类篇目较多，是《尚书》的主体部分。《虞书》的《皋陶谟》，《商书》的《盘庚》、《西伯戡黎》，《周书》的《金縢》、《大诰》、《多士》、《君奭》等篇都是诰体。

3. 誓。君王诸侯的誓众词。《尚书》中属于“誓”这一种体式的总共九篇。其中八篇是战争誓词，即《夏书》的《甘誓》、《胤征》，《商书》的《汤誓》，《周书》的《泰誓上中下》、《牧誓》和《费誓》。一篇是秦穆公的悔过作誓，即《尚书》的末篇《秦誓》。

4. 命。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者赏赐诸侯的册命。《君陈》、《毕命》、《君牙》、《冏命》、《文侯之命》诸篇都属于这一类。

先秦没有纸张，《尚书》写在竹简木片上。这种竹简木片称为“策”或“简策”，长短有规定的标准尺寸。郑玄《论语序》说：

“《易》、《诗》、《书》、《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论衡·宣汉篇》也说：“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读，朝夕讲习。”每策字数多的 25 字，少的有 22 字^③。一篇几千字的文章，一写就要写上几十策。写固然不容易，收藏更为困难。简策是竹、木制成的，很容易朽毁。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十分频繁，《尚书》自然就越传越少了。文献还记载《尚书》曾经受到人为的大规模破坏。《孟子·万章下》记载卫国人北宫锜向孟子询问周朝的官爵和俸禄等级制度。孟子回答说：“详细情况已经不能够知道了，因为诸侯厌恶那种制度对自己不利，都把那些文献典籍毁灭了。”（原文：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丞相李斯奏请“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样，民间所存的《书》策，被秦始皇烧了；秦王朝从商、周王朝那儿接管的所有文献典籍，自然也包括商、周王朝记录君王言行的大量《书》策，后来又被项羽火烧咸阳化为灰烬。《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抢出的仅仅是些秦王朝的律令和户籍地图。《尚书》经过各种的磨难，特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战火，丧失了许多篇目内容。

汉代，《尚书》的传本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今文本，一个是古文本。

今文本《尚书》由伏胜传授。伏胜，史籍上多称为“伏生”，“生”是古代对有学问人的尊称。《史记·儒林传》说伏生曾经担任过秦王朝的博士官。他手头有一部《尚书》，秦末楚汉战争期间，兵荒马乱，伏生逃到外地避难，临行时想把《尚书》带走，然而一部《尚书》总有几千片简策，怎么带？伏生就把《尚书》藏在自家墙壁里。一直到了汉惠帝刘盈取消禁书令，伏生才搜寻藏书，发现已经朽烂了几十篇，只乘下二十八篇。篇目次第如下：

1.《尧典》，2.《皋陶谟》

以上《虞书》。

3.《禹贡》，4.《甘誓》

以上《夏书》

5.《汤誓》，6.《盘庚》，7.《高宗肅日》，8.《西伯戡黎》，9.《微子》。

以上《商书》。

10.《牧誓》，11.《洪范》，12.《金縢》，13.《大诰》，14.《康诰》，
15.《酒诰》，16.《梓材》，17.《召诰》，18.《洛诰》，19.《多士》，20.
《无逸》，21.《君奭》，22.《多方》，23.《立政》，24.《顾命》，25.《费
誓》，26.《呂刑》，27.《文侯之命》，28.《秦誓》。

以上《周书》。

伏生是山东济南人，他就用这二十八篇在齐、鲁间讲授。伏生的《尚书》是秦王朝的官方定本，已根据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诏令用秦的隶书改写过了。汉承秦制，隶书仍然是汉代的日常通用文字，所以这个隶书写定本叫做“今文《尚书》”。文和字在古代是同义词。今文《尚书》意思就是“现今通用文字书写的《尚书》”。又因为这个隶书写定本是由伏生传授的，也称为“伏生本”。

《史记·儒林传》记载汉文帝刘恒发现朝廷皇家藏书里没有《尚书》，民间唯一能够讲授《尚书》的伏生又90多岁了，不能应召入朝，就命令著名学者晁错到伏生家里去，向伏生学习《尚书》。晁错转抄伏生本二十八篇带回朝廷，收入皇家书库。后来，朝廷又从民间求得一篇《泰誓》，也编入“伏生本”，王充《论衡·正说篇》称“《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所以《史记·儒林传》和《汉书·儒林传》都说伏生本有二十九篇。这二十九篇今文《尚书》是汉代的官方定本。

《尚书》的另一个本子是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记载，

汉武帝末年，分封在孔子家乡的鲁恭王刘余喜欢建造宫室，看中了孔子的宅基。在拆毁孔子故居的墙壁时，发现墙中藏了几部先秦典籍，大概是孔子后代为了免于秦火偷偷收藏的。其中有一部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尚书》，计四十五篇。孔子的第十一世孙孔安国得到了这部《尚书》。孔安国学过今文《尚书》，又懂得古文字。他用伏生的本子对照一读，发现四十五篇中有二十九篇基本相同，另外，还多出了十六篇，篇目如下：1.《舜典》，2.《汨作》，3.《九共》（九篇）4.《大禹谟》，5.《弃稷》（益稷），6.《五子之歌》，7.《胤征》，8.《汤诰》9.《咸有一德》，10.《典宝》，11.《伊训》，12.《肆命》，13.《原命》，14.《武成》，15.《旅獒》，16.《冏命》。

《尚书》学史上称这多出的十六篇为“逸书”或者“逸篇”，意思是“原本失传现又发现的书篇”。后来，孔安国担任了朝廷的经学博士，就把这十六篇“逸书”连同与伏生本基本相同的二十九篇全部献给朝廷，也收入皇室书库。因为这四十五篇《尚书》是用先秦古文字写的，所以叫“古文《尚书》”，又因为这个本子是从孔子家墙壁中发现的，也叫做“孔壁本”，或“壁中本”。

孔安国相信壁中本是上古原始版本的《尚书》。为了推广这个本子，他曾经用隶书精心摹写了与伏生本基本相同的二十九篇，并作了一些新的解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至于十六篇“逸书”孔安国感到不好理解，就没有强作解说。“逸书”始终没有在民间流传，一直作为皇室藏书，只有像司马迁那样的少数学者才有机会阅读，后来在汉末或魏晋的战乱中丧失了。

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除篇数多少和字体的差异外，并无多大区别。西汉传授伏生今文《尚书》的主要是欧阳高、夏侯胜和夏侯建三家。《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以中古文（就是皇室书库所藏的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

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古人口耳相传，老师讲授，学生笔录，今文《尚书》流传一百多年，刘向用与之相应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对照，仅有 700 多字不相同，脱了三简，大约也只失掉六、七十个字。可见两个版本的差异并不算大。

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虽然内容基本相同，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来源也不同。学者们自然有的相信今文《尚书》，有的相信古文《尚书》。相信今文《尚书》的就研究和讲授今文《尚书》。相信古文《尚书》的就研究和讲授古文《尚书》。伏生的学生欧阳高、夏侯胜和夏侯建为今文《尚书》写过“章句”、“解诂”。所谓“章句”、“解诂”就是对《尚书》的章节词句进行解说。孔安国也为古文《尚书》写过“传”。“传”就是对《尚书》经文的注释。汉代传授今文《尚书》的称今文学家，传授古文《尚书》的称古文学家。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有差别，研究的方法又不同，他们的门徒又注重师法家法，逐渐形成《尚书》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

今文《尚书》学派注重阐述微言大义，解说繁琐空疏，并且抱残守缺，死守家法师法。《汉书·儒林传》记载夏侯建门下有一个叫秦恭的学者，讲解《尚书》，“增师法至百万言”。《汉书·艺文志》颜师古的注释引用桓谭的《新论》说秦恭解说《尧典》的第一句“曰若稽古”四个字，竟写了三万字。解说《尧典》篇名两个字的意义，甚至写了十多万字。今文学家远离经文，随意发挥，产生了很多流弊。《汉书·艺文志》就指出“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古文《尚书》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考订典章制度，比较受学习者的欢迎。然而古文家的解释工作是在宣扬圣道王功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有不少强经就我的不正确训诂。仍以《尧典》的“曰若稽古”为例，“曰若”是句首语气词，无义。“稽”义为“查考”。这句话的意思是“查考古事”，说明《尧典》是后人追写尧舜

时的历史。古文家为了把《尧典》看成尧舜时的实录，宣扬圣道王功出于尧舜。释“若”为“顺”，说尧“顺考古道”。或释“稽”为“同”，释“古”为“天”，说尧“能顺天而行，与之同功”。这些无根之说，与今文家秦恭的繁琐空疏、漫无边际，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

西汉今文学家多数在政治上有势力，今文《尚书》长期立于学官，作为国家规定的研究和讲习科目。汉宣帝时更把今文《尚书》的欧阳高、夏侯胜和夏侯建三家全都立于学官，各置一名博士。博士又传授给博士弟子，博士弟子成绩好的可以做官，没有做官的可以私人传授，因此，学习今文《尚书》的人越来越多，今文《尚书》学始终处于统治地位。终汉一代，今文《尚书》一直是官方规定的标准读本。东汉末年，朝廷把立于学官的今文学派各经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昭示天下，这就是有名的“汉石经”。《尚书》石经采用欧阳高的本子，校以夏侯胜、夏侯建的本子，不同的字刻在《尚书》全经之后。石经是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工刻石的，或称“熹平石经”，因为仅仅用隶书一种字体书写，又叫做“一体石经”。

西汉古文学家人数比较少，古文《尚书》也一直没有能够立于学官。汉武帝刘彻时，孔安国担任博士，曾希望朝廷把他创立的古文《尚书》学也作为官方承认的学派，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汉哀帝刘欣时，刘向的儿子刘歆曾整理皇室书籍，他认真阅读和研究了各种古文经，向哀帝建议应该公平地对待古文《尚书》等古文各经，应该都立于学官，设置博士。当时朝廷里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学家，执政大臣也大多出身于今文学家，他们竭力反对刘歆的主张，刘歆也失败了。但是，刘歆曾写过一封信责备五经博士为了自己的利禄前途排挤古文学。这就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刘歆在这封信中列举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古文经的来源，强调这些古文献的学术价值，对后

世影响较大。哀帝死后，王莽掌权。《汉书·刘歆传》记载王莽和刘歆年轻时“俱为黄门郎”，是好朋友。王莽重用刘歆，让刘歆“典儒林、史、卜之官”。各种古文经很快全部立于学官，古文《尚书》当然也成为官方规定的研究和讲习科目，古文《尚书》学家不少都做了大官。王莽垮台以后，东汉王朝又很快取消了古文学，《尚书》一经仍然仅仅保留欧阳高和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学。但是，古文《尚书》学家已是人多势重，又经过杜林、贾逵等著名学者的相继努力，终于确定了古文《尚书》学在学术界的优勢。到了魏文帝曹丕时，古文《尚书》又重新成为官学。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更被刻成石经。这就是“魏石经”，或“正始石经”。石经是用先秦古文字、秦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的，又叫做“三体石经”。

《尚书》的今、古文之争，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古文《尚书》经说的分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各自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不同，有的是各自对经文的理解不同，有的则是毫无意义的立异。今、古文《尚书》学派的纷争既促进了《尚书》学的发展，也给《尚书》笼罩上一层又一层迷雾。《尚书》今、古文之争延续到东汉末年的马融和郑玄，出现新的局面。马融和郑玄都精通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虽然他们都为古文《尚书》作了注解，但是注解的篇目是与“伏生本”基本相同的二十九篇，并且采取了一些今文经说。马融、郑玄以他们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基本实现了今、古文《尚书》学的统一。他们的注解流行以后，各家的注解都逐渐消失了。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发生了“永嘉之乱”西晋王朝覆灭。官方藏书遭到严重破坏，今文《尚书》的各种版本全部丧失，“逸书”十六篇也全部丧失了。晋时，民间已经没有人讲习今文《尚书》。“永嘉之乱”彻底结束了今文《尚书》学的传授历史。

东晋元帝司马睿执政时，豫章内史梅赜(zé 贲)向朝廷献出